

千／古／奇／谋／系／列

● 中州古籍出版社



商家

智谋全书

Shangjia Zhimou Quanshu

贾嘉麟 张民服 齐迎建 主编

千／古／奇／谋／系／列



前 言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
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
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
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
术，终不告之矣。

——商人祖师白圭

德国学者利希霍芬曾经指出：“世界上两个公认为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而在最为聪明而善于经商的中华民族中，商人尽管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位次最后，却是文化素质仅次于士而且最为聪敏的阶层。明人吕柟有一则寓言，是说西邻之家有五个儿子，一子朴讷，一子聪敏，一子目盲，一子驼背，一子跛足，于是他就因人制宜，让朴讷的去务农，聪敏的去经商，目盲的去算卦，驼背的去搓麻，跛足的去纺线，结果人尽其才，丰衣足食。自然，就利益而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要数从商的聪敏之子获利最巨了。

商人和商业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其历史与人类文明史一样漫长。据文献记载，传说中的“神农之时”，就已“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上古时代的虞舜，曾贩货于顿丘，运盐于传虚。商族的先人王亥亦曾在夏朝时驾车服牛，进行长途贸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弃官经商、因势逐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臆则屡中”、

“结驷连骑”、商学兼优的端木赐(子贡)，“乐观时变”、经营有术，被奉为商人祖师的白圭，以及“奇货可居”、由经营商业进而经营天下的阳翟巨贾吕不韦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成为后世崇拜的偶像。太史公司马迁认为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因而在《史记》中专列《货殖列传》，让商人们与帝王将相、诸子百家一样在史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传统商人与商业经历了一条荆棘丛生的曲折之路。直到唐宋以降，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影响才逐步扩张起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流通扩大，商路进一步拓展，城市经济发达，区域性市场形成，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等十大商帮)出现，人们的商业观念也发生重大转变，出现了一个商业大潮，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遗憾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未能产生革命性的飞跃，从而成为社会近代化的推动力量。

尽管在诸子百家之中，没有专门的商人之学，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之中，商业文化典籍至为稀见，然而植根于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沃土，中国商业文化涵盖既广，底蕴亦深，经营智慧丰富多彩，足资观瞻。诸如尚德诚信、义利两立的商业伦理，察时观变、取予有道的经商方法，完物上种、质高货真的经商根本，善任厚待、管理有术的用人之道，薄利多销、储饶待乏、诚一专注、胜自出奇的经营策略，亦商亦文、士魂商才的儒商精神，等等。总之，是以人为中心，“借驾驭人理来变幻物理，借调度人性来开发物用，借策动人心来提升物价，借操纵人事来消弥物争”，从而成功地实现商业诸环节的转化，达到商业活动的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获取商业利润。认真总结弘扬传统商业文化和经营智慧，并借鉴西方商业精神与经营管理经验，加以创造性的开发与利用，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传统商业文化典籍而言，除前述之《史记·货殖列传》外，作为专书，在明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随着晚明商业大潮的涌现，

才催生了一批商业书,或称商书。这些书籍多由商人编写,或专为商人编写,在商业领域之中传抄流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明清商书,从广义上讲包括商人日用通书、商业交道路程书、商业训诫之书等,现存近二十种。这些书往往内容庞杂,很多是商人日用百科全书,如《万宝全书》、《三台万用正宗》,专业性较强的如《士商类要》、《士商必要》、《士商要览》、《商贾便览》等,既有路程图引、社会常识,也有专门性的商业指导、训诫内容;另有一些是专门的路程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天下路程》、《示我周行》、《商程一览》等;只有一部分堪称专门的商业文化典籍,如《商贾一览醒迷》、《生意世事初阶》、《江湖必读》等。同时,这些书内容多系传抄汇编而成,前后雷同较多。此外,限于商人的文化水准,且功利性强,这些书大都通俗易懂,但大多数都有错讹较多、刊刻粗糙的缺点。由于轻商贱商观念,这些实用性的商书只在商界流传,加之社会动荡,典藏保存下来的不多。虽然如此,这些商书仍然具有较高的商业文化价值,使我们得以进入商人的文化心理世界,领略他们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和非凡智慧。

本书在广泛收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为标准,除收录《货殖列传》外,收选了四种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商业文化典籍,加以校勘和白话翻译,个别内容只加校点。书后编有两个附录,一曰商论,收集单篇商业文献;二曰商典,介绍有代表性的商业典故。本拟另编附录三商诗,因未及就绪而暂付阙如。

现将此四种商书略加说明:

《士商类要》四卷,明代徽商程春宇编撰,天启六年(1626年)文林阁唐锦池刻印。卷首有图,卷一为水陆里程;卷二前半部为水陆里程,后半部有《客商规略》、《为客十要》、《买卖机关》等经商格言训诫及出行吉日、占候风云等;卷三为商人须知的各种常识,包括地理、历史、王府、职官、科举等;卷四则是商人自我修养规则。内容丰富,很有实用价值。正如方一桂序所说:“皆为工商切要,政犹之布帛菽粟,

利用甚宏。”

《客商一览醒迷》，明代闽商李晋德编撰，崇祯八年（1635）刊行，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分上下两栏合刻。此书国内已无存，孤本存日本山口大学。主体内容是《商贾醒迷》，为格言式训诫之作，颇具商业文化价值。原书中《警世歌十六首》插于其间，此次整理移于其后。

《生意世事初阶》，抄本，共72则，为清代洞庭商人王秉元纂集，经沙城汪溟氏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加删润”。此书专论坐商（铺商），详尽而通俗地介绍了坐贾培养学徒及店员与顾客做生意的方方面面，堪称康乾盛世江南坐贾经营的经验总结。后附《贸易须知辑要》（上下卷）原藏日本京都大学，内容与此略同，惟保留不少山西方言，学者推断为在《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晋商读本。

《商贾便览》八卷，清代江西商人吴中孚编撰，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此书兼及行商与坐贾经营，内容系统而全面，堪称明清商书的代表作。本书仅选录第一、二、三、五、六卷，第四卷为算法摘要，第七卷为时令佳句、月令别名、书信称呼、字义四则，第八卷为天下路程，已无现实意义，故删略。

本书的编校，参考了杨正泰、张正明、夏维中等先生的相关成果，特致谢忱。

总之，以上诸书，大体反映了传统商业文化典籍的基本概貌，从中不难识见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智谋之精华。当然，一些不适于今天的内容和封建性的糟粕，还需要加以鉴别和扬弃。希望此书对有志于了解和研究传统商业文化的读者有所帮助，对身处市场经济社会的广大朋友有所借鉴和裨益。

目 录

货殖列传	(1)
士商类要	(25)
卷一 (略)	(25)
卷二	(25)
客商规略	(25)
为客十要	(29)
买卖机关	(32)
杂粮通论	(56)
船脚总论	(59)
贸易赋	(63)
经营说	(67)
醒迷论	(68)
戒嫖西江月	(71)
选择出行吉日	(71)
四时占候风云	(73)
卷三 (略)	(74)
卷四	(74)
乾坤定位	(74)
人伦三教	(76)
起置诸物	(77)
先贤名士	(78)

2 商家智谋全书

丧礼古制	(79)
起居格言	(80)
起居杂忌	(81)
起居之宜	(84)
阳宅宜忌	(86)
人事防闲	(87)
四时调摄	(89)
随时避忌	(91)
饮食杂忌	(91)
立身持己	(93)
省心法言	(95)
思虑醒言	(96)
养心穷理	(97)
居官莅政	(97)
孝顺父母	(98)
敬兄爱弟	(98)
和睦宗族	(99)
勤读书史	(99)
谨戒戏谑	(99)
戒浪饮酒	(100)
禁作无益	(100)
寡验阴晴	(100)
四季杂占	(103)
警世歌诗	(106)
历科及第(略)	(110)
文职公署(略)	(110)
武职公署	(110)
为政规模切要语	(110)

金科一诚论	(113)
客商一览醒迷	(114)
商贾醒迷	(114)
悲商歌三十首	(237)
警世歌十六首	(241)
警世歌二十四首	(243)
逐月出行吉日	(245)
憎天翻地覆时	(246)
杨公忌日	(247)
六十甲子逐日吉凶	(247)
生意世事初阶	(251)
附:贸易须知辑要 卷上	(283)
贸易须知辑要 卷下	(293)
商贾便览	(298)
卷一	(298)
江湖必读原书	(298)
工商切要	(339)
卷二	(362)
经营粮食	(362)
出行兴败行船开张吉凶日	(368)
诸神圣诞风暴日期	(372)
各省船名样式	(375)
卷三	(381)
各省疆域风俗土产	(381)
新增各省土产	(414)
异国口外土产	(416)
外国方向	(417)
各省买卖大马头	(417)

4 商家智谋全书

各省关税	(419)
各省盐务所出分销地方	(420)
茶引	(421)
漕运河工省分	(421)
卷四	(422)
算法摘要(略)	(422)
卷五	(422)
平秤市谱	(422)
辨银谱总论	(422)
辨银则例(略)	(423)
辨银名色(略)	(423)
辨银增要	(423)
元宝有三假	(427)
银有三难看	(427)
看银有三要	(428)
各处倾出高低样式名色(略)	(428)
卷六	(428)
应酬书信	(428)
卷七	(467)
时令佳句(略)	(467)
月令别名(略)	(467)
族亲称呼(略)	(467)
字义四则(略)	(467)
卷八	(467)
天下路程(略)	(467)
附录一 商论	(468)
商贾	(468)
检商贾篇	(468)

钱神论	(469)
附:成公绥《钱神论》	(471)
商贾纪	(471)
商战	(476)
商务	(482)
附录二 商典	(497)
端木生涯	(497)
陶朱事业	(497)
计然之策	(498)
“言治生,祖白圭”	(499)
买椟还珠	(500)
奇货可居	(501)
文君当垆	(502)
石崇斗富	(503)
“王家富窟”	(503)
“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503)
沈万三秀	(504)
“钻天洞庭”	(505)
“无徽不成镇”	(505)
红顶商人	(506)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	(507)

货殖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辄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穀、笋、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洿鹵，人民寡，于

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纒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文】

老子说：“升平治世发展到极盛之时，邻国之间相互可以望得见，鸡鸣犬吠之声相互可以听得见，而人民各自以自己的饮食为甘美，以自己的服饰为漂亮，安于各自乡里的民情风俗，乐于各自所从事的生涯，直到衰老死亡也不互相往来。”如果一定要以此作为追求的理想，在最近之世，要想堵塞人民的耳目，那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太史公司马迁说：关于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是无法知道的。至于像《诗经》、《尚书》所记述的虞舜、夏禹以来的情况，就是人们的耳目要极力享受音乐歌舞和美食，口要品味穷尽各种肉食美味；身体安于放纵游乐，心中则自夸有权有势的荣耀。统治者的这种流俗不断地影响着民众，已经由来已久了，如今即使拿老子的上述玄言妙论逐门逐户地引导劝说，终究也不可能感化他们。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就是对民众进行教诲，又次就是用政令对民众加以约束，最下策是与民众相争。

山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树、苧麻、旄牛、玉石；山东则有丰富的鱼、盐、漆、丝……江南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珍珠、象牙、皮革；龙门（在今山西河津西北和陕西韩城东北的黄河禹门口）、碣石（今河北昌黎西北）以北的地区则有丰富的马、牛、

羊、毡裘、兽畜之筋与角等资源；而铜和铁则千里远近，许多地方都有，星罗棋布，出于山中。这是关于全国各地物产的大致情况。这些物产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是民间习用的被服、饮食、养生、送死的东西。因此，人们要依靠农民耕种生产粮食来吃饭，依靠猎人、渔夫开发山林川泽中的各种物产，依靠工匠制造器物、营建宫室，依靠商人交易货物，互通有无。这难道是因为官府的政令教化、征集调发或者民众之间事先约定才如此分工吗？不是，而是人们各任其能，各尽其力，以便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货物的价格低贱必定是价格昂贵的前兆，价格昂贵必定是价格低贱的前兆，人们各自勉力从事自己的本业，以所从事的工作为乐，就像水往低处流动那样，日以继夜，没有停息之时，不用招请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要求便会自动把各种东西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既与事理相符、又是自然规律的验证吗？

《尚书·周书》上说：“如果农民不生产粮食，那么人们就会没有饭吃；如果工匠不做工，人们就会缺乏日用的器物；如果商人不做买卖，人们就会缺乏各种珍奇货物；如果掌管山泽的虞人不开发山泽之物产，那么国家的财源就会匮乏。”财源匮乏，那么山林川泽也就无法进一步开辟了。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民众衣食的本源。本源大了，那么生活就富足，本源小了，那么生活就贫困。本源大，富国富家。贫困与富贵是有其自然的法则的，没有谁能够夺取和赐予的，聪慧精巧的人富而有余，愚蠢笨拙的人穷而不足。所以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那里的土地盐碱化，人烟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鼓励妇女从事纺织刺绣之类的生产活动，使技巧逐步提高到很高的水平；又让人们从事渔业和盐业及其贸易活动，结果使天下人才和货物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流聚到齐国。所以，齐国的冠带衣履可供天下服用，富甲四方，声威大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诸侯君长们都毕恭毕敬地前往齐国朝拜归服。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奉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进行改革，设置九府管理

商品货币、市场流通,从而使国力大增,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使天下走上正道,共同遵奉周天子的正统;而管仲也得以受封三归之地,虽居于陪臣(诸侯大夫)的地位,却比各诸侯国的君主还富有。因此,齐国国富民强,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的时代。

所以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而君子富有,就能很好地表现其美德,小人富有,而能够专心用其力气,乐于从事其本业。河水深了,鱼儿就能生长其中;山林深了,野兽就能往来其中;人们富有了,仁义就能附益其家。富有之人得到权势,就越发显赫,一旦失势,就没有宾客来依附,因而更加不高兴。这种情况,在边疆少数民族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民间谚语说:“富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杀身之罪而被弃市。”这并不是空话。所以人们说:“天下熙熙,都是为利益而来;天下攘攘,都是为利益而往。”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享有食邑万户的诸侯、掌管百户乡邑的长吏,尚且害怕自己贫穷,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粢,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粢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

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保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保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译文】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受困于会稽山，于是就重用范蠡、计然，图谋复兴国家。计然说：“知道将要打仗，就要加强战备；了解人们何时会使用什么货物，也就算懂得商品了。掌握了‘时’与

‘用’二者变化的规律，那么各种各样货物的流通状况也就可以洞察无遗了。所以根据阴阳五行的变化，岁在金，就会丰收；岁在水，就要歉收；岁在木，就会有饥谨；岁在火，就会出现旱灾。干旱之时，就要准备舟船，以等待出现洪涝之时所用；洪涝之时，就要准备车舆，以等待出现干旱之时使用，这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道理的。每六年出现一次丰收，每六年出现一次干旱，每十二年出现一次大的饥荒。出售粮食时，如果粮价过低，每斗二十钱，那么农民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如果粮价过高，每斗达到九十钱，那么从事工商业的人就要蒙受损失。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受到损害，那么财货器用就无所出；如果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土地就得不到耕种了。粮价每斗高不过八十钱，低不少于三十钱，这样农民与工商业者都能获得利益，粮食平价出售，其他商品价格也适当调整，关税的税收和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都不缺乏，这是符合治国理财之道的。积贮货物的常理，是务求完美无缺的高质量的货物，而不要滞息不流的‘死钱’。在商品交易之中，注意不要留存容易腐败变质的货物，更不要冒险囤积以待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不足的情况，就会知道贵与贱的辩证关系。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而价格降低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贵。当货物价格昂贵之时，必须乘机抛出，视若粪土而不怜惜；而当货物价格低贱之时，必须乘机买入，视同珠宝金玉而加以珍惜。要使商品和货币的周转像流水一样不要间断。”勾践采纳其计，经过十年治理，国家富强起来，运用丰厚的钱财去收买和激励士兵，使他们甘冒矢石，冲锋陷阵，就像口渴得到饮水一样，从而消灭了强大的吴国，进而北上会盟诸侯，扬威中原，号称“春秋五霸”之一。

范蠡协助越王勾践洗雪了会稽之耻以后，便慨然长叹说：“计然的计策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了雪耻复国的愿望。他的计策既然施用于治国已经取得了成效，我还想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离开越国，驾一叶扁舟漂泊江海，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做鸱夷子皮，到了陶这个地方就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这个

地方处在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都从四面八方通达这里，商品的流通是十分便利的。于是他就在这里治理产业，囤积货物，适时通变，运用智谋致富，而不仅仅依靠人力经营。所以，他作为一个擅长生财致富的人，能够正确地选择人才，而因时观变，十九年间曾有三次积累到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贱之交以及本家的远房兄弟们。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富有，而能够很好地表现其美德。后来，范蠡年老力衰，就听任子孙经营，其子孙继承并治理其产业，并有所发展，使家财积累到万万钱，所以人们谈论起天下的富豪都对陶朱公称誉不已。

子贡(端木赐)跟随孔子学习以后，回到卫国做了官，同时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做起了买卖。在孔子的七十多个高足之中，端木赐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另一位高足原宪(子思)贫穷得连糟糠之食都吃不饱，栖身于一个贫寒的小巷子中。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拜访、馈赠诸侯，所到之处，诸侯国君无不与他分庭抗礼，平等相待。正是有子贡在人前人后称道和宣传，才使得孔子能够在当时就名扬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富有之人得到权势，就越发声名显赫吧！

白圭是西周(今河南洛阳)人。当魏文侯在位之时(公元前445年—前396年)，李克致力于尽地力之教，进行变法，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年成丰歉和市场行情的变化，所以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经营法则。年成丰收时，就买进粮食，而出售丝、漆；蚕茧结成之时，就买进丝帛，出售粮食。太岁在卯，就会五谷丰登；第二年将会年成不好。太岁行至午位，就会出现大旱；第二年将会年成丰收。太岁行至酉位，就会五谷丰登；第二年将会年成不好。太岁行至子位，就会出现大旱；第二年将会年成丰收，雨水会很多。太岁行至卯位时，年成很好，他贮积的货物比平常年份要多出一倍。要想多赚钱，便买进价钱低的下等粮食；要想使粮食增产，便买进上等谷物作为种子。白圭能够做到饮食节俭，克制嗜好欲望，衣着朴素，与他所任用的伙计、奴仆同甘共苦，捕捉有利的经营时机，就像凶猛的野兽、飞禽搏取